

# 北洋政府时期九世班禅的和平呼吁 及其时代意义

蒲生华

**[摘要]**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不休,国本动摇,民不聊生。1924年,初到内地的九世班禅耳闻目睹了战祸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浩劫,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面对烽火不断的时局,九世班禅不忍坐视,他以函电、演讲、谈话等多种方式,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不遗余力调解纠纷,义无反顾呼吁和平。九世班禅曾两次致函善后会议,郑重提出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的意见和建议。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国奉战争、晋奉战争等军阀争战中,他多次通电全国,陈说利害、劝息纷争,倡导和平。同时,在每一次的干戈冲突中,九世班禅不断向参与纷争的各方或函电劝解,或派员调和,竭力调停各方矛盾,争取和平。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百姓于水火,他还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陈言内战危害,呼吁交战各方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重,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在接受新闻界访谈时,他谈话的重点内容往往是表达对混乱时局的关切,一如既往地陈述他一贯的和平主张。凡此种种,都传递着他那强烈的息战愿望,浸透着他浓浓的爱国情怀。在他的爱国精神感召下,社会各界纷纷赞同其和平主张,并表示尽最大努力消弭战祸。文章认为,九世班禅的和平呼吁,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乱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唤醒国人的作用,激发了人们的家国情怀和爱国自觉,社会影响巨大;同时对此起彼伏的军阀混战也起到了些许缓解作用,具有一定时代意义。

**[关键词]** 北洋政府;九世班禅;和平呼吁;军阀混战;时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 K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7 (X) (2022) 02-0076-13

北洋政府时期,以直系、皖系、奉系等为首的大小军阀,往往为了各自利益,置国家安危、人民利益于不顾,相互之间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动辄大动干戈、兵戎相见。连年兵祸使得不少地方

千疮百孔、赤地千里，连天烽火让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外有列强环伺，内部兄弟阋墙，军阀混战使原本苦难深重的中国更是雪上加霜。面对这种亲痛仇快的局面，不少志士仁人以各种形式不遗余力，奔走呼吁，希望各方罢兵停战，共保和平。九世班禅就是其中颇具影响的一位。

由于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发生在1924年之前，当时九世班禅忙于后藏政教事务，无暇也无力顾及发生在内地的军阀纷争。1924年年初，九世班禅到达内地，此后数年，耳闻目睹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江浙战争、浙奉战争、国奉战争、晋奉战争等各军阀之间的混战。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给广大老百姓造成的苦难，给国家带来的危害，九世班禅看在眼里、急在心间。为救国家于危亡、拯百姓于水火，九世班禅于北洋政府后期（1924—1928），以电函调停、发表谈话等多种形式来调解纷争、呼吁和平。九世班禅的这种劝息兵戈、消弭战祸之举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军阀混战的乱局，但也得到了当时朝野上下、交战各方的一致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对军阀间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起到了缓解和遏制作用。

## 一、致函善后会议：消弭战祸，倡导和平

1924年10月的“北京政变”中，代表直系军阀的大总统曹锟下野，皖系军阀段祺瑞被推为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为巩固其统治，缓和当时紧张的时局，于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参加善后会议的有各地军阀代表及政客百余人，当时九世班禅尚在进京途中。此前，段祺瑞曾多次致电、派员催促其入京参加会议，由于种种原因，九世班禅未能按期入京莅会，但他从太原派遣大堪布洛桑坚赞为代表赴京参会。

就在善后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九世班禅于1月27日拟就书信一函，交给28日由太原起程赴京的洛桑坚赞，吩咐其呈交善后会议筹备处。这封书信强调“第一要紧事”是今后各方冰释前嫌，化解矛盾，只要大家一心为国，消除兵争，自然民生安乐。信中认为引发战事的原因是那些“做大官秉权者，彼此因小有嫌怨，渐至闹大，酿出国内兵争，丧军民之生命，耗国家之金钱，其原因皆起于做大官秉权者自私之一念”，期望“今后尽释前嫌，化除我见”。<sup>①</sup> 信函分析内战不绝的原因，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对各军阀之间解除成见、尽释前嫌的愿望，晓足抗首，抱以信心。书信中还在这次大会给予厚望，认为此次大会乃国家之公事，非一己之私事，望各位与会代表出于公心，通盘考虑，消除争战，实现和平统一。只有这样，则利民强国的愿景可望实现。

善后会议召开期间，九世班禅再次向大会郑重提出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意见书鞭辟入里，层层说理，以林秀众鸟安栖、林摧鸟无所依，船坚可达彼岸、浪高易毁舟楫，登高览尽风景、处凹难觅全貌，重地亩之中间、轻边隅之硃瘠等设喻，来譬况“世界民族建立国家，必有固定之疆域、良好之政治、高远之观察、公平之法律，而后能长治久安，永保统一”的基本规律。还指出：“国家建设之根本计划，须先得地方无战争，然后可期实施。现在中国战事不断，如野草然，经一度之野烧，暂时消灭而根株在地，春风一吹，萌芽又生。是故欲救今日中国，非实施新国家之建

<sup>①</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2页。

设计划不可,欲实施新国家建设计划,非弭止时起时伏之地方战争不可;欲弭止时起时伏之地方战争,非深明致此战争之潜在祸根掘而尽之不可,欲掘尽战争之潜在祸根,非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弟兄、如手足,自相捍卫、自相保护不可。”<sup>①</sup>挥洒千言,切中时弊。九世班禅以一片赤诚之心,陈述内战的危害;以一番肺腑之言,阐发消除祸端的深刻见解。字里行间透露着让各方势力团结一心、停息干戈的祈望,其闾言崇议,振聋发聩;其利害陈述,发人深省。

善后会议是在北洋军阀进一步分崩离析和国民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召开的旨在维护北洋军阀统治的会议。虽然其本质是脱离人民的、是反动的,但对于初来乍到的九世班禅来说,还不能完全认清其本来面目,因而他对这次会议的期望值依然很高。因之,他两次致函善后会议,消弭战祸,倡导和平。由于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使得九世班禅停止内战的和平倡议未能收到实质性的效果,然而他心系国家安危,屡屡建言献策的赤子情怀,饮誉天下,海内同钦。

## 二、多次通电全国:劝息纷争,呼吁和平

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军阀混战更是变本加厉,如火如荼。无休止的征战使得城乡经济萧条、家园颓败,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景。辗转于全国各地的九世班禅,目睹这一人间惨剧,内心悲恻不已。出于保家卫国的责任担当以及佛家救困扶危的慈悲情怀,他多次通电全国,发救民觉世之言,劝息兵戈,呼吁和平。

### (一) 旨在“速息内战”的西安“艳电”

1924年10月20日,九世班禅一行离开兰州赶赴西安,此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火在江(江苏)、浙(浙江)、直(直隶)、奉(奉天)等地熊熊燃烧,同时也蔓延到豫陕一带。当九世班禅一行途经陕西乾县、礼泉一带时,适逢胡景翼部与刘镇华部在此处鏖战,一路走来,满目疮痍。沿途的血雨腥风,让人触目伤怀,战争带给国家和人民的遍体鳞伤,使九世班禅忧心忡忡。这时的九世班禅深切感受到和平的可贵和团结的重要,于是在他抵达西安后的11月29日通电全国,发表了旨在速息内战、共谋和平的西安“艳电”。

“艳电”一语破的,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值风雨飘摇之际,正危急存亡之秋,亟应速息内战,力图上理。”就在全中国上下理应同心戮力、定倾扶危的紧要关头,令人痛心的是“烽烟未靖,风鹤频惊”,针对这一现状,电文饱含深情,发出让人猛醒、令人深思的慨叹:“同室操戈,既貽煮豆燃萁之消,渔人伺利,将成摘瓜抱蔓之忧。”兄弟阋墙的惨痛,渔人伺利的教训,每一个国人应该牢记,若其不然,必然招致祸端,故而电文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担忧:“唇既亡而齿自寒,皮不存而毛焉附!非惟中原锦绣,同蹈陆沉;且虞边塞藩篱,亦供刀俎。”这种隐忧不是揆理度情,更不是耸人听闻,因为列强覬覦,边疆渐被蚕食的情状已成为现实的存在。电文对症下药,言必有中,“沿途感闾里之萧条,知战祸不可再延,元气亟宜休养”,如果战祸再延,势必元气大伤,势必导致国步方蹇。面对艰难时局,九世班禅真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悬悬而望,“所望彻底觉悟,共保和平,免阋墙之纷争,谋

<sup>①</sup> 《班禅之消弭战祸谈 实行五族共和》,《晨报》1925年4月6日第3版。

根本之建设”。<sup>①</sup> 守望和平、消除纷争、共谋发展是九世班禅通电的根本目的，也是他翘首以盼的期待。

有的放矢、鞭辟入里的西安“艳电”，是九世班禅向全国第一次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劝息纷争是目的，实现和平是愿望。“艳电”发救国之音，倡和平之声，九世班禅抱诚守真的呼吁，目的是敦促征战各方临崖勒马，息兵罢戈。

## （二）意欲“条陈大计”的太原“元电”

1925年1月5日，九世班禅一行由西安抵达太原，受到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的优渥招待。虽然舟车劳顿之苦得以暂歇，但其沿途所经、所见、所闻的战祸兵苦，使之久久难以释怀。民生凋敝的景象，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性创伤，一直萦绕在大师的心间。在太原期间，处于晋地方政府“隆遇”中的九世班禅依然寝食难安，他一直苦苦思索救国救民之良策，“似觉小有心得”后，便于13日发出通电，谓将有统一大计条陈。此电就是九世班禅意欲向当局建言献策的太原“元电”。

太原“元电”就“中国如何而能统一中兴，官吏如何而可正本清源，人民如何而得安居乐业”等问题，打算向“中央各省之秉国权者”“主张公道，直言以陈”。对各方争战不休问题，主张罢兵息争，尤其强调“非望暂时息争，固望永除战祸之根”。<sup>②</sup>

太原“元电”是一份继往开来的通电，它上承西安“艳电”劝息纷争之旨，下启致善后会议意见书中的消弭战祸、五族共和的“大计”。“元电”虽是一份探询当权者能否建言献策的电文，但其意义非凡，它连接着九世班禅消弭战祸的一贯主张，也承载着他爱国护民的济世情怀。

## （三）感于“众生困敝”的杭州通电

1925年4月27日，九世班禅在浙江督办孙传芳、省长夏超的盛邀下启锡赴杭，道经南京、上海等地时，江浙战争留下的荒凉破败景象触目皆是。江浙一带，本江南锦绣之地，湖光山色，物阜民富，而今山河虽在，然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凄怆扼腕。“班禅额尔德尼，此次赴杭，道经宁沪，见大战之后，民生凋敝，十室空九，颇为悲痛。”<sup>③</sup> 5月1日，抵达杭州的九世班禅，回想沿途的情景，情难自禁。于是，在杭州观山阅水、弘法讲经之际，特发出通电一件，呼吁和平。

电文首先明确“我国山原苍茫，藏富无穷，民俗敦朴，坚苦有为”，本该依托丰富的物产、勤劳的人民，齐心努力，大有可为；无奈战伐“频年之故，众生困敝，十室空九”，战伐不断造成的是民不聊生，这一结果谁也承受不起。为避免生灵涂炭，九世班禅不厌其烦、一如既往地呼吁交战各方息兵罢戈，“愿当政诸公，互相谅解，永息戎机。譬如家庭骨肉之间，断无不能携手言欢之理。若有政见不同，尽可互掬款诚，共商国是”。电文最后的殷切希望是“统一早成，和平实现”<sup>④</sup>，这是九

① 《公电·西安班禅电》，《申报》（上海版）1924年12月10日第4版。

② 《班禅条陈统一大计 电询可否容许建言》，《大公报》（天津版）1925年1月16日第3版。

③ 《班禅摘藻抒辞 洋洋洒洒娓娓煌煌》，《京报》1925年5月21日第7版。

④ 同上。

世班禅呐喊呼吁的目标,也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

杭州通电是因“众生困敝”的时局有感而发,“江浙发生战祸,两省受创弥深……或全镇被毁,或抢劫一空,或转徙流离,莫名惨状”<sup>①</sup>。江浙民众罹此战祸,商贾停顿歇业、耕夫背井离乡,村镇萧条,众生困敝,而造成这一景象的直接原因亦是军阀混战。因之,此电与其他通电一样,其动机依然是劝息戎机、呼吁和平。

#### (四) 恳请“速罢战争”的北京“尾电”

1925年年底,军阀混战愈演愈烈。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张作霖的奉军之间爆发战争,史称“冯张战争”或“国奉战争”。这场战争一开始由冯张对垒,后逐渐演变为张作霖联手吴佩孚、阎锡山等与冯玉祥部的鏖战。直到1926年8月,冯军不支,败退西北。冯张战争持续9个多月,战火所及,哀鸿遍野。就在冯张战争正处激烈、胶着之际,九世班禅于1926年4月5日在北京发出通告天下的“尾电”,对国内各派系之间兵戎相见、干戈不休的局面深表担忧。呼吁各方以民族利益为重,以百姓生活为念,停止攻伐,和平相处。

“尾电”内容再现了冯张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描述了军阀混战带给老百姓的惊恐与苦难,“日来飞机抛掷炸弹,北京城内居住人民,如在裂炸之中,惊骇万状,愁不可言,岂能栖身?”对战争的根源,也是一语道破,“近因中国政治未安妥善,彼此意见隔阂,大起干戈,相互残杀无休”。电文以一片送袍推襟的诚意,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和平安定的期待,“北京等各方战事不息,国家政治,立根为本旨。无仇无怨,数万群生之性命,无故惨伤。代民伸冤,诸公速罢战争,和平解决,永远自然安定”。<sup>②</sup> 为国立本、替民伸张,期盼息争、向往和平。九世班禅的一瓣心香,发自肺腑。

“速罢战争”是这份“尾电”所表达的迫切愿望,呼吁和平依然是电文的主旨。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局面,九世班禅不置身事外,不作壁上观,而是痛陈疾呼,积极作为,目的无非是转纷争为和平、化戾气为祥和。不遗余力地呼吁,披露腹心的劝告,完全出自爱国爱民、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其心昭昭,其情切切,其意殷殷。

### 三、竭诚调停各方:陈说利害,争取和平

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九世班禅目睹这一人间惨象,一方面向全国发出通电,频频劝导,谆谆告诫;一方面向争战各方去电去函,陈说利害,积极调停。在每一次的干戈冲突中或函电劝解,或派员调和,竭力调停各方矛盾,争取和平。

#### (一) 浙奉战争中“愿作调人”

1925年10月,奉系军阀势力向东南各省的不断扩张,招致当时在东南地区颇具势力的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的大为不满。为了稳固和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10月10日孙传芳在杭州与浙、闽、苏、

<sup>①</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2—223页。

<sup>②</sup> 《公电·北京班禅电》,《申报》(上海版)1926年4月8日第6版。

皖、赣五省代表密谋，决定先发制人，将奉系势力逐出东南各省。15日，以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东南地盘向奉军驻地发动突然袭击，浙奉战争（亦称“孙奉战争”“第三次直奉战争”）爆发，一时间东南地区刀光剑影、战云翻滚。时在五台山礼佛诵经的九世班禅闻悉东南烽火之事，不忍袖手缄默，迅即向各方相关政要去电，或劝告双方以国家大局为重，平息戎机，恢复和平；或恳请其他政要从中斡旋，使交战各方息兵罢战，言归于好。同时表示自己为使战祸消弭，愿意奔走各方，调停时局。“班禅自晋起程时，曾致电孙张两君，其电文曰：近闻贵境有起兵端之说，不胜惊骇。我国人民连年灾荒，筹款赈抚，尚且不及，而又民生涂炭，务请两君俯赐矜怜人民之苦，即时罢解兵戈，言归于好。班禅不敏，愿作调人。”<sup>①</sup>

10月底，九世班禅致电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恳切规劝双方指示其部属息兵停戈，造福国民。认为“以积弱之中华，经此摧残，必致民穷财匮，启异族之窥觎，于国家前途，有百害而无一利”；深切期望双方“罢战言和，一则国家蒙无穷之福利，二则同胞保旧日之交情，三则兵士免原野之暴露，一举而众善备焉，亦何乐而不为此耶？”还特别表示如果能够调和时局，愿意牺牲一切，在所不辞，“此即班禅区区之私，即为调和牺牲一切，皆所不恤”。<sup>②</sup>同日，九世班禅又向湖北督军萧耀南和河南督军岳维峻去电，指出江浙战祸“其始不过彼此将领间偶生误会”而已，“务望各释嫌疑，言归和好，同处中国，俱属同胞，总可商量解决”，大可不必兵戎相见。电文对当前兵祸再延之事，深为忧虑，望萧、岳二人“从中解劝，俾化干戈为玉帛。如视班禅为可以调解之人，即派员前往，亦无所辞劳”<sup>③</sup>，使直奉双方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并称愿意派人前往，调停时局。

11月2日，九世班禅从五台山抵达太原，此时，以张宗昌为首的奉系军队和直系孙传芳部在苏北、皖北一带鏖战犹酣。5日，九世班禅致电孙传芳和张宗昌，电文对其豆相煎之所为，焦虑万状，痛心疾首，“中国生灵涂炭，已达极点，如战祸再开，则如堤防溃决，洪水横流，势难遏止，非但元气凋丧，国本亦濒于动摇。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希望“双方和平解决，言归于好，无以兵戎相见，化干戈为玉帛，奠国家于磐石……刍尧之言，如蒙采纳，则当勉作调人，以效绵薄”<sup>④</sup>。极力劝导相互息争弭祸，望双方握手言和，造福国家和人民，并表示愿意为争取和平而奔走效力。

## （二）国奉战争中“调停时局”

1925年12月爆发的国奉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国民军全军参战的第一场战争。其实，在浙奉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坐镇张垣的冯玉祥指挥国民军分别向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部进军，直接威胁奉军后方，国奉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就在杀伐在即之时，1925年11月7日九世班禅从太原抵达北京后，于9日致电国民军首领冯玉祥将军，电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时国事飘零，再经战乱，于国于民，两俱无利。”然后再三设喻，分析战祸绵延、终无休止的原因是“恩仇报复，循环不已”，

① 《班禅愿作调人 请张孙罢兵》，《晨报》1925年11月8日第13版。

②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 张冯等一致复电赞同》，《京报》1925年11月21日第5版。

③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 张冯等一致复电赞同》（续昨），《京报》1925年11月22日第5版。

④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重庆：中正书局，1943年，第216—217页。

希望“一言之出，重于九鼎”的冯将军“从中和解”，创造和平环境。并特别表明“但有可以驱使鄙人之处，苟利国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sup>①</sup>。接着，致电奉系将领——天津督办李景林，陈述战争危害，“战端一开，无论孰胜孰负，所残害者总系本国之同胞，所损失者总系本国之财产，于中华前途，有百害而无一利”。希望李氏调停内争，争取和平解决。同时亦表示“本人情愿斡旋，不辞劳苦，但有效力之处，无不惟命是从”<sup>②</sup>。

尽管国奉战争还未全面爆发，但具有政治敏锐性的九世班禅未雨绸缪，事先对双方当事人忠言劝诫，屡次三番强调战争的危害性，言辞之中透露着对和平的渴盼。在国奉战争初期阶段，九世班禅的劝解调停对象主要集中在国民军将领岳维峻身上。河南军务督办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在1925年11月中旬就制定了兵分两路，同时进攻直、鲁两省的军事计划，并付诸行动。九世班禅闻之，迅即向岳维峻致电，望其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罢兵言和。随着岳维峻部的两路进攻加剧，九世班禅再次致电岳维峻，敦其停止杀伐之事，并表示欲前往河南，当面陈说利害，调停时局，“班禅再电岳（维峻），调停时局，拟来汴一行”<sup>③</sup>。

### （三）晋奉战争中派员调和

1927年9月，由于奉军争取晋军合击冯玉祥不得要领、相互掣肘，导致双方矛盾加剧。27日，驻守大同的晋军商震部奉命阻断了京绥铁路西段交通。29日，大同镇守使李生达又奉阎锡山密令，在大同扣押了赴晋北校阅军队的奉军将领于珍等人。当天，阎锡山发出誓师讨奉通电。10月1日，张作霖亦发表通电，对阎锡山大加痛斥。4日，正式发布讨阎明令。于是，晋奉战争爆发。

晋奉两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争战不断，杀伐不休，正在内蒙古巡锡传法的九世班禅听闻此事，甚为忧虑。11月23日致电张作霖、阎锡山，对奉晋爆发战事，深感不安。指出现国家正值危难之秋，同室操戈，实为痛心。呼吁双方摒弃前嫌，以国家利益为重，为人民幸福着想，早日熄灭战火，“当此列强环伺，外交紧急之秋，正我国安危千钧一发之际，国难一日不息，即民生一日不宁，而国防一日不固。内乱愈殷，外侮益迫，亡国灭种，惨祸堪虑，兴言及此，不寒而栗。况奉晋原系兄弟，多年袍泽，兴兵构怨，绝非出于本心。现势虽成骑虎，果能降心相从，为天下让，则化干戈为玉帛……”<sup>④</sup>并表示如果双方垂念民生、罢战言和，即派代表前往晋谒，请示机宜。

九世班禅发往晋、奉的“愿任调停之意”的电文有了回应，班禅“已接复电，可允商量”<sup>⑤</sup>的允诺后，即刻派出安经活佛为调和代表前往北京，1928年1月6日抵京的安经佛谒见国务总理潘馥，向当局汇报班禅现状及此行目的，“安经佛出国务院后，即赴元帅府投谒张作霖，陈述来意，并谓奉方有何意见，渠日内拟遄赴太原，见阎锡山转达一切”<sup>⑥</sup>。

① 《班禅之和平通电与张冯等之复电》，《顺天时报》1925年11月18日第3版。

②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 张冯等一致复电赞同》，《京报》1925年11月21日第5版。

③ 《班禅尚欲调停》，《晨报》1925年11月29日第2版。

④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第219页。

⑤ 《班禅派代表调和奉晋 安经佛昨午谒潘》，《大公报》（天津版）1928年1月7日第2版。

⑥ 《班禅调停奉晋 安经佛来京》，《晨报》1928年1月7日第2版。

#### （四）二次北伐中的欲派调人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并下达总攻命令，国民革命军的二次北伐正式拉开序幕。北伐军迅速击溃盘踞山东一带的张宗昌、孙传芳部，继续北上攻奉。与此同时，冯玉祥、阎锡山等部配合国民革命军，在直隶一带与奉军展开大范围鏖战，战况极为惨烈，民众深陷困苦。面对战云翻滚的局面，九世班禅悲悯伤怀，不忍坐视。

5月16日，因悯生民涂炭，电请交战各方息争言和，救民水火。电文“泣恳双方，悬崖勒马，垂念民艰，勿为意气，勿念尤愆。以悲天悯人之怀，行救国安民之实。戎端早息，泽惠普沾”。并表示自己日夜馨香默祷，强调如能罢兵息戎，定派员晋谒请示，“如蒙鉴纳，罢兵言和，班禅派亲信安经佛、堪布噶金王子由等，晋谒请示”<sup>①</sup>。“晋谒请示”实为自谦辞令，言外之意就是派遣安经佛、王堪布（王乐阶）等前往调停时局，劝息兵戎。

### 四、发表谈话演讲：关切时局，翘盼和平

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军阀派系林立，相互间的斗争复杂而剧烈。局部冲突，司空见惯；大规模战争，时有发生。1924年以来，几乎每一次军阀战争都有九世班禅呼吁、劝和的声音。发电致函，化解矛盾，这是九世班禅调停争战各方的惯常方式，除此而外，他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及对新闻界的谈话中，也在一如既往地表达他一贯的和平主张。微谏不倦的函电，承载着九世班禅对手足相残的痛心、人民痛苦的惋惜和国家安危的关切。同样，他在各种场合中谈话演讲的重点同样是表达对混乱时局的关切，一次次闳言崇议中浸透着他那强烈的息战、和平愿望。

1925年3月20日，九世班禅在接见北京各宗教团体代表李明炎时谈道：“余此次不惮跋涉，来到北京，即为实行五族一家，促进全国升平而来。吾国历年纠纷，纯为党争所致……”<sup>②</sup>阐明自己晋京不仅是出于实现“五族一家”之愿望，更为“促进全国升平”之目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国历年纠纷”的真正原因在于“党争”。换言之，要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就要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只有停止“党争”，方能实现和平。九世班禅时刻关注时局、心系国家，对当时鏖战不休的原因炳若观火，对和平局面的祈盼铭心镂骨。25日，善后会议专门举办欢迎九世班禅茶话会，他在演说中直陈：“善后会议为解决时局纠纷，本人素抱五族平等主义，极望善后会议将中国一切之问题解决，俾谋全国之和平。”<sup>③</sup>对善后会议给予厚望的九世班禅，满怀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彻底解决混乱时局，早日结束军阀混战，透露出对和平的殷殷翘盼。

九世班禅对当时时局的关切，主要集中在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战和攻伐，在谈话演讲中不时表达对内战的痛心和担忧，并透露出对和平社会的殷切向往和期盼。1925年3月26日，在北京瀛台接见某学会代表时强调：“中国内地不睦，纠纷丛生……期望太平甚切，常为祝祷。”<sup>④</sup>既表达了对

<sup>①</sup>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益世报》1928年5月19日第3版。

<sup>②</sup> 《班禅热心国民会议》，《益世报》1925年3月23日第7版。

<sup>③</sup> 《善后会议昨日欢迎班禅》，《益世报》1925年3月26日第7版。

<sup>④</sup> 《班禅之谈话》，《晨报》1925年3月27日第3版。



动辄以兵戎相见时局的隐忧,又切望国内太平,各方势力和平相处。4月30日,在赴杭途中路经上海时,上海官绅在圣母院路范宅为之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对在座沪上名流答谢时表示:“深望中国不再罹兵争之祸,日臻强盛。”<sup>①</sup>5月3日,杭州军政各界在省教育学会召开欢迎班禅大会,他在答谢词中同样表达了对和平的期望,“惟希望国内永泯争端,共享和平,实为厚幸”<sup>②</sup>。对国内连年战祸和各种争端深为关切,迫切期望中国不再遭受兵祸、各方永泯争端,殷切盼望国家日益强盛、共享和平。

九世班禅对和平的期望不只限于国内,他还从佛家的普惠思想出发,愿天下太平,世界和睦。1925年5月17日,九世班禅从杭州返京,途经上海时,当地官商在总商会议事厅宴请九世班禅,他在宴席致谢词中云:“溯自释迦牟尼成佛以后,为众生说法,以递传至于余,为公众祈祷和平,实为应负之责任。惟余不但求中国之和平,即对世界各国,均当以和平相待,使世界跻于和平。”<sup>③</sup>作为藏传佛教领袖,九世班禅始终以佛家的慈悲情怀为众生谋福祉,并以此为已任。6月1日,九世班禅在瀛台宴请全体国务委员及执政府军警界各要人时,即席发表演说时表示:“本人极愿在京,祈祷中国以后之和平。”<sup>④</sup>祈祷和平是他在北京期间全力以赴的首冲要务,可见和平的时局在他心中的分量。10月下旬尚在五台山避暑礼佛的九世班禅,听闻浙奉战争爆发,焦虑万分,夜不成寐,旋即派遣大堪布洛桑囊木嘉晋京谒见段执政,代表班禅向其转达对时局的担忧,“寰宇分崩,干戈如麻,亟盼执政迅速设法,消弭兵灾,振导和平,使人民得安枕席”<sup>⑤</sup>。对连绵不断的干戈之争,九世班禅一方面向交战双方致函致电,劝和调解;另一方面向段执政表达自己的和平主张,敦促其发挥中枢作用,设法消除兵祸,统揽全局,振导和平。

## 五、九世班禅和平呼吁的时代意义

通过不同形式的呼吁,九世班禅全力阻止军阀混战,积极调和各方纠纷,为国内团结、社会安定、人民幸福而奔走呐喊,劝息争战。虽然他的和平呼吁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战乱、扭转时局,但他使国家“久安长治,永保统一”<sup>⑥</sup>的爱国情怀及“设法吁劝,恢复和平”<sup>⑦</sup>的愿望,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反响,一度唤起国人的情感共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警愤觉聩的警示作用,激发了人们的家国情怀和爱国自觉,社会影响颇为深远;同时对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的军阀混战也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凸显其时代意义。

### (一) 和平呼吁得到云集响应

九世班禅以和平呼吁为主旨的函电,得到社会各界的纷纷响应。尤其是那些公开发表的全国通

① 《班禅赴杭前在沪之行动》,《大公报》(天津版)1925年5月5日第5版。

② 《各界欢迎班禅大会记》,《申报》(上海版)1925年5月4日第10版。

③ 《官商欢迎班禅之宴会》,《申报》(上海版)1925年5月18日第13版。

④ 《班禅前晚请客情形》,《社会日报》(上海版)1925年6月3日第4版。

⑤ 《班禅振导和平》,《社会日报》(上海版)1925年10月24日第3版。

⑥ 《班禅之消弭战祸谈 实行五族共和》,《晨报》1925年4月6日第3版。

⑦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 张冯等一致复电赞同》,《京报》1925年11月21日第5版。

电，一经见诸报端，各方复电、各种回应便纷涌如潮，云集响应。这些通电在当时社会反响很大，影响深远。

1924年11月29日的西安“艳电”发出后，其劝息内争、永罢干戈的和平愿景，引起了社会轰动，全国各地的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纷纷复电响应。“一时党政军教诸闻人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胡景翼、孙传芳、王聘卿、熊秉三、孙慕韩、汪伯唐、赵次珊、王幼山、黎宋卿、徐菊人、梁任公、严范孙、张敬尧、孙伯兰、吴子玉、康更生、岑云阶、章太炎、张季直、谭祖菴、胡展堂、陈竞存、齐燮元、韩紫石、萧耀南、李景林、阎锡山、吴俊升、蔡锷、刘镇华、陆洪涛、杨增新、杨森、邓锡侯、刘禹九、郑士琦、吴光新、刘甫澄、唐绍仪、赵倜、章嘉呼图克图、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和硕杜陵、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中华教育改进社，均有电响应，主张和平。”<sup>①</sup>从电复回应者的身份地位来看，都是当时社会各界中的非等闲之辈。其中既有民国前总统孙中山、黎元洪（黎宋卿）、徐世昌（徐菊人）等，又有民国政坛耆宿熊希龄（熊秉三）、孙宝琦（孙慕韩）、汪大燮（汪伯唐）等；既有北洋军阀大佬张作霖、吴佩孚（吴子玉）、孙传芳等，又有地方军政要人阎锡山、萧耀南、蔡锷等；既有文化名流康有为（康更生）、梁启超（梁任公）、章太炎等，又有著名实业家张謇（张季直）、著名教育家严范孙、宗教领袖章嘉活佛、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各界翘楚。除此而外，中华教育改进社、北京筹边协会等社会团体亦有电文响应。可以说，班禅当时的第一份通电具有“一石激起千重浪”般的社会效应，得到了当时大多军政要员、社会贤达及部分群众团体的积极回应。其覆盖面不可谓不广，其影响力不可谓不大。

同样，1925年1月13日的太原“元电”、1926年4月5日的北京“尾电”等通电发出后，亦得到了不少政府首脑、地方大员、社会耆宿的广泛回应和声援。各方的积极响应和表态，使得产生的社会反响更加强烈，形成的社会影响愈发深广。因为对九世班禅和平呼吁的积极回应者，或为中枢秉钧持轴者，或为地方执牛耳者，或为各行业德隆望重者……他们皆为当时社会的精英分子，这些人往往具有“振臂一呼，万众响应”的能量和气魄，他们是不同阶层、不同派别、不同领域的代言者和引领者，能够代表各行、各界、各地大部分民众的共同心愿，因而具有普遍性意义，社会影响巨大。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各界要人和社会团体对九世班禅函电的广泛回应，不只是一种对和平呼吁的单纯响应，更是汇集各方思想和观点，形成一股团结凝聚的向心力量。

## （二）和平主张赢得广泛认同

综观社会各界的复电，其内容主要有三种：一是对九世班禅心系国家安危、积极呼吁和平的精神表示钦佩；二是对其停战主张和爱国精神深表赞同；三是表明自己态度，为平息戎机、共保和平大计愿效绵薄。以上三点，是各界要人对九世班禅爱国精神与和平主张的肯定和认同，尤其是对其劝息争战、消解内讧之举，无不赞同，无不感佩。

九世班禅发人深省、催人猛醒的和平呼吁，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他的一封封函电盈满真情，发出了不少人想发而未发的沉痛呼声。在如雪片般的复电中，各方政要对纷乱不休的内战表示

<sup>①</sup> 陈文鉴编著：《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上海：大法轮书局，1948年，第3—4页。

痛心疾首,对其消弭战祸的主张和呼吁众口如一,纷纷赞同。针对旨在劝息争战的西安“艳电”,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回电称:“当此国步艰难之秋,惟有速息内争,共维大局,树本至计,甚佩嘉谟。”<sup>①</sup>电文对九世班禅的和平主张极为嘉许,认为“速息内争”是为根本之计;陕西督军刘镇华复电云:“冀同胞彻底之觉悟,促全国正确之和平。俾四百兆托命之民,亟拯出水火,十三年相寻之乱,永剔根株。”<sup>②</sup>民众苦兵已久,希望永罢干戈,这是一名地方长官感于班禅的和平愿望而吐露的肺腑之言;湖北督军萧耀南来电谓:“年来战祸频仍,元气凋伤。尊以悲天悯人之意,发救民觉世之言,力励澈悟,共保和平。”<sup>③</sup>不仅道出连年烽火的极大危害,并且对九世班禅的和平呼吁深表赞赏、寄予厚望。九世班禅的和平倡导,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异口同声的回电内容,表明其和平主张赢得了广泛认同。

九世班禅呼吁和平的电文多“以慈悲之旨,发微妙之音。唤醒内争,冤亲平等”<sup>④</sup>。陈说利害、晓之大义的函电内容,让各方争战者心服首肯,而且还希望他继续发劝和之音,唤醒大众,争取早日实现和平。山东督军郑士琦在回复太原“元电”时曰:“民久苦兵,国不堪乱,想望宁息,心同理同。仍望发抒真谛,无任祈祷。”<sup>⑤</sup>对宁息争战的主张十分称赞,同时盼望九世班禅继续“发抒真谛”,为和平事业贡献力量;时任川滇防务督办的刘湘也希望“与法座同心戮力,固圉安边”<sup>⑥</sup>;浙江督军孙传芳复电,盼望大师继续“发扬正觉,拯拔迷途”<sup>⑦</sup>……从各方政要对九世班禅在劝和息争中所寄寓的殷切之望中,反映了劝和之声已逐渐成为时代主音。

九世班禅痛陈利害、力弭争端的和平主张和建议,无疑是乱世之秋的一股清流,同时也彰显了他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各方政要的反应中,对其爱国行为,深表感佩;对其和平建议,给予肯定;对其和平主张,形成共识。甚至不少人还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行动,为班禅大师和平愿景的实现而助力。

### (三) 和平倡议引起社会共鸣

九世班禅的和平倡议,旨在救亡图存。他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函电演讲,往往直奔主题,将国家“正危急存亡”的凶险处境和盘托出。面对九世班禅救亡图存的呼声和倡议,各方军政长官、社会各界名流,无不感同身受、无不感动莫名,纷纷应诺尽己之力,力挽浩劫。他的警世之言激起国人的情感共鸣,其救亡图存的爱国之情,不仅已成为国人共识,且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种社会责任和共同担当。

1925年10月28日,他在对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岳维峻的去电中指出:“倘此时兵祸再

①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第247页。

② 《刘镇华复班禅电》,《大公报》1924年12月19日第3版。

③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第247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249页。

⑦ 同上。

延,非至孑遗靡存,社稷邱虚而不已。”<sup>①</sup>这种预测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消弭兵祸,恐怕离“孑遗靡存,社稷邱虚”的结局不远矣!电文发出不久,萧耀南电复称:“奉军果班师出关,联军决不愿以兵戎相见。请大师在京,出任调停。”<sup>②</sup>岳维峻亦对九世班禅“悲天悯人”的调停电文,“莫名钦仰”<sup>③</sup>。的确,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本动摇,安能善果?当头棒喝中,每个局中人如醍醐灌顶,他们在反思反省中自然而然建构起一种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家国情怀。

九世班禅的不少劝和电文,分析时下中国内外交困的形势,痛陈疾呼,切中肯綮。他曾多次强调:若不停止战乱,中国将进一步被列强瓜分肢解,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以此引起国人警觉。1925年10月28日,致电奉天张作霖、汉口吴佩孚时指出:“以积弱之中华,经此摧残,必致民穷财匮,启异族之窥觎,于国家前途,有百害而无一利。”<sup>④</sup>晋奉失和期间,致张作霖、阎锡山电文中进一步指出:“内乱愈殷,外侮益迫,亡国灭种,惨祸堪虑。”<sup>⑤</sup>虎视鹰瞵,强敌窥伺,手足相残之下,定会给外敌以可乘之机。国难当头之际,九世班禅心系国危,不敢自安缄默。多次发救国之论,以警世之钟,惊醒愚顽。他不断呼吁,强调“五族人民同心合力,如弟兄、如手足,自相捍卫、自相保护不可”<sup>⑥</sup>。唯如此,才能抵御外侮,才能得以自保。九世班禅的救亡图存之论,在当时社会各界中引起极大震动,中枢要人、军阀首脑,纷纷表示息兵止戈,共挽危局。

#### (四) 和平意愿取得初步效果

九世班禅的和平愿景就是结束军阀混战,共谋发展。他的停战主张,得到了大多军阀派系的积极响应和配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争的频密度,缓解了杀伐的激烈度,其消弭战祸的愿景初见成效。

1925年年底,东南一带“军阀重开战”,九世班禅分别向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李景林、萧耀南、岳维峻等去电调解,呼吁和平,大家纷纷回电表示赞同。冯玉祥复电中谓班禅大师“广词引喻,主张和平,正符下怀”,对其和平愿景深表赞同,指出“玉祥体我佛慈悲之旨,维护和平,始终一贯”<sup>⑦</sup>。李景林复电中对九世班禅“爱国爱民,无任钦佩”,强调“景林酷爱和平,默愿勉维危局。兹承嘱,已据电力劝鲁督张效帅矣!”<sup>⑧</sup>就连心傲气盛的张作霖也复电称自己“不忍再起兵端,现已一再退让,大局或有和平之望也!”<sup>⑨</sup>各方对九世班禅的停战呼吁不仅服膺斯义,并力图进行、付诸行动。行见连天烽燧,胥化祥和,一缕和平曙光在翻滚的阴霾中似乎破云而出。

1926年4月5日,九世班禅在北京通电全国,呼吁各方以民族利益为重,以百姓生活为念,停

①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 张冯等一致复电赞同》(续昨),《京报》1925年11月22日第5版。

② 《班禅之和平通电与张冯等之复电》,《顺天时报》1925年11月18日第3版。

③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第251页。

④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 张冯等一致复电赞同》,《京报》1925年11月21日第5版。

⑤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第219页。

⑥ 《班禅之消弭战祸谈 实行五族共和》,《晨报》1925年4月6日第3版。

⑦ 《班禅之和平通电与张冯等之复电》,《顺天时报》1925年11月18日第3版。

⑧ 同上。

⑨ 《班禅通电呼吁和平 张冯等一致复电赞同》(续昨),《京报》1925年11月22日第5版。

止征战，和平相处。“尾电”发出之后，旋接各方回电，均表示赞成和钦服，并且以实际行动来加以回应。热河都统宋哲元以最快的速度复电，陈述西北军素以和平为重，以救国救民为主旨，并指令部下“束兵以待”<sup>①</sup>。察哈尔都统张之江则表态“敝军罢兵，实鉴于此”，并表达其和平愿望，“之江深自忏悔，渴望和平”<sup>②</sup>。作为交战一方的西北军，其高级将领宋哲元、张之江等的暂缓争战之行动，实际上是对班禅和平建议的完全认同和全力支持，也为当时烽火不断的乱局带来了一线和平希望。

当然，九世班禅的和平呼吁，虽然在消弭战祸方面也显现出一定成效，但实际效果还是不太理想，它只能是对战争有所缓解，而并非根除。这让更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九世班禅的和平呼吁在当时北洋政府统治乏力、各地割据势力林立的形势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枢机构，军阀混战的局面就很难控制。

总之，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内外交困，饱尝忧患。外国列强的蚕食鲸吞，已经让中华民族国本动摇，岌岌可危，加之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烽火连天，使得国家濒于亡国灭种的边缘。初到内地的九世班禅不忍坐视，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大声疾呼，倡导和平。目的是让国人团结起来，力挽狂澜，来共同完成民族救亡这一首冲要务。九世班禅以佛家之慈悲情怀、以赤子之爱国热忱，垂念民瘼，挺身而出，勇敢挑起调解各方、呼吁和平的责任，以函电、演讲、谈话等形式穿梭于各方之间，苦口婆心，坚持“向中央各省之秉国权者，贡献此心”<sup>③</sup>，其大义之举、赤忱之情不仅让海内同钦、万众仰赖，更让那些热衷于内耗者汗颜心惭。他那不遗余力的和平呼吁，是凝心聚力的动力；他那救亡图存的闳言崇议，无不感动着每一个国人。在九世班禅爱国精神的感召下，不少国人形成了一种爱国自觉，也使更多有志之士投身于和平事业。

[本文责任编辑（特约） 杜冰梅]

[作者简介] 蒲生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硕士生导师，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宁 810008）。

① 刘家驹编译：《班禅大师全集》，第 251 页。

② 同上。

③ 《公电·太原班禅额尔德尼通电》，《申报》（上海版）1925 年 1 月 18 日第 6 版。

multi-ethnic cultures in any academic research.

**Keywords:** Place name of rGyal rong; Textual research; dMu rdo; Jia liang; Eastern Kingdom of Women

## **A Look a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smology of Bon Religion through Dunhuang Manuscripts**

**Ngag-dbang rGya-mtsho, Tshe-ring bKra-shis**

**Abstract:** There seems to have formed a conclu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at the dualism cosmology of Bon religio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Persian Zoroastrian, and the duality of light and darkness constitutes one of the basic contents of Bon doctrine. This conclusion is based on the ancient Bon literature *Srid pavi mdzod phug*. According to the Bon cosmology record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re are theories that the heaven has nine layers or thirteen layers, which is the early Bon cosmology. After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concept of thirteen layers of heaven has evolved into that of thirty-three layers of heaven, which can be found in *mDo gzer mig*, *mDo vdus*, *mDo dri med gzi brjid* and some ritual texts. The theory of thirty-three layers of heaven comes down to “triadism”. The basic classics of Bon religion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black, white, and varicolo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iadism” into dualism was completed in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on religion, form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to some extent it also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Bon religion; Cosmology; Triadism; Dualism

## **Study on the Ti shri Ras pa of the Western Xia (Tangu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ANG Zi-chao**

**Abstract:** Tibetan materials have showed that the Tibetan monk Ras pa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of building temples and disseminating Buddhism in the Western Xia (Tangut) for nearly 30 years, eventually became the last Imperial Preceptor (Ti shri), witnessed the demise of the Western Xia Regime, and h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many existing Buddhist relics of the late Western Xia in the Hexi reg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biographical documents of Ti shri Ras pa, and then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mages of eminent monks wearing black hats in the Western Xia Regime.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that the image of eminent monks painted in the front room of Mogao Cave 465 in Dunhuang is Ti shri Ras pa.

**Keywords:** Mogao Cave 465; Tibetan Buddhism in Western Xia; Ti shri Ras pa; Iconolog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 **The Ninth Panchen Lama's Appeal for Pe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PU Sheng-hu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 the warlords fought incessantl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was shaken, and the people were miserable. In 1924, the ninth Panchen Lama witnessed an unprecedented dis-

aster in the mainland, which brought great suffering to the Chinese people. Fac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tant flames of war, the ninth Panchen Lama could not bear to sit and watch. He hovered between various forces by means of letters and telegrams, speeches, conversations and so on. He spared no effort to mediate disputes and called for peace. The ninth Panchen Lama wrote to the aftermath meeting twice and solemnly put forwar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eliminating the scourge of war and implementing the Chinese Republic of five ethnic groups. In the second War between Zhi and Feng, War between Jiang su and Zhe jiang, War between Guo and Feng, War between Jin and Feng and other warlord wars, he repeatedly electrified the whole country, stated his interests, advised disputes and advocated peace. At the same time, in every fighting conflict, the ninth Panchen Lama kept persuading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dispute by letters or telegrams, or sending personnel to mediate, trying to mediate the contradictions of all parties and strive for peace. In order to save the country from danger and save the people from water and fire, he also delivered speeches on various occasions, stating the harm of civil war, calling on the belligerents to put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 dispel past grievances and make peace. When interviewed by the press, the focus of his conversation was often to express his concern about the chaotic situation and stated his consistent peace proposition as always. All these were conveyed by his strong desire for peace and war, soaked with his strong patriotic feelings. Inspired by his patriotis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ad agreed with his peace proposition and expressed their best efforts to eliminate the scourge of war. Although the appeal for peace of the ninth Panchen Lama could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war, it played a role in awaken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a certain extent, stimulated people's feelings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patriotic consciousness and had a great social impac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layed a somewhat mitigating role in the incessant fighting between warlords, which had a certain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Keywords:** Beiyang government; The ninth Panchen Lama; Appeal for peace; Fighting between warlords;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 On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Tibetan Local Annual Tribute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Yu-tong

**Abstract:** The Qing government clearly stipulated the annual tribute of the two sPrul-sku system, i. e. , the Dalai Lama and the Panchen Erdeni,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and appease the Tibetan people, thus becoming an effective system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to manage Tibet and consolidate its rule. Since the Qianlong reign, annual tributes in Tibet showed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in terms of type and quantity, which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religious articles, characteristic textiles,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food, daily necessities and special tributes, and the tributes were not all local things. The tributes that flowed in the frequent exchanges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Tibetan local government served as the material carrier of the Tibetan annual tribute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main connotation is a political symbol centered on national identity. On the one hand, it is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Erdeni's respect, prayers, and gratitude to the Qing emperor.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flow of